

# 以资产为本推行社区经济发展

## —— 香港的经验与实践

黄 洪

**内容提要** 本文以香港非政府机构圣雅各布福群会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为模型,考察了香港近年来运用资本建设理论所实施的“社区经济发展计划”,即通过社区“时分券”和“时分报”的互通来解决各方在生活实际中的困难。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以劳动时间为交换单位的“时分券”互助形式是一个操作性较强,且有实际效果的模式。在此我们想把该形式介绍给大家,供各界参考。

**关键词** 以资产为本 社区 社区经济发展 互助计划

黄 洪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

谈到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首先要谈谈资产建设(Asset building),那么什么是资产建设?根据M. 谢尔登教授(Michael Sherraden)所创立的社会发展中心对资产建设的定义我们知道,资产建设是指将资源累积并投资于社会及经济发展。当然投资可以是人力、社会或实质资本。由于资产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跨代的幸福和有跨代的资产累积与发展,因此它对低收入家庭有正面的影响,更能协助这些人士长远脱离贫穷。

那么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说的又是什么。正如Kretzmannh与McKnight强调的,一个邻舍社区若只被看成是“有需要”及“有问题”的,那是一个“空虚”

的社区,即它要依靠外来推行的服务,居民只能处于被动、无力、及依赖外在协助及援助的位置。而当一个社区被描述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社区,那么居民所拥有的技能就有可能被用于社区的事项或解决问题,外来帮助只是辅助性的,因此,用资产为本来考察社区,就是社区内的人还有没有需要或问题,如果有看是否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路来面对挑战。

Kretzmannh与McKnight认为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有三大原则:1. 以资产为本(Asset Based)社区发展的策略是由社区中有什么开始的——居民及工作人口的能力;地区中的组织及团体,而不是社区中缺乏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2.“以内部为焦点”(internally focused)是要加强居民建议及解决问题的能力;3.“以关系作推

动”(relationship driven)是延续并建立本地居民、本地组织及本地团体之间及内部的关系。

简单地说,社区经济发展强调以社区为本,即发挥区内居民拥有未受市场利用的才能、技术与经验,来服务本社区和其它社区中的成员。这种服务一方面可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令参与者重获生活的意义及尊严。它具体包括创建小型企业以增加职位;成立生产及消费合作社;推行社区的货物及服务交换。实践证明社区经济发展的方法对重建社区经济、加强社会融和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均有成效(Sherraden & Nimacs, 1998)。也就是说通过社区经济的建立,可以让居民参与社区的发展与建设,而通过参与,居民可以掌握更多的资源、信息,学会如何去提出诉求或建议,如何建设理想的社区,从而达到“增权”的目的。

社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或重建社区中的组织,令区内居民增权及改善生活,社区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目标是令社区中所有的成员能够得到良好生活的所需资源。可以说这与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强调以区内拥有什么资产为介入手段的方法一脉相承。比如,社区内的失业及贫穷人士、愿意参与社区服务的各界人士、被弃置的二手物品,以及长期荒废的土地及店铺等被忽略的资产。这些被弃置、淘汰而不被利用的资产,正是社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资产,而重新检视、保养、使用及发展这些资产,将这些生产因素串连起来成为可以重新再用的资源,也能为纯市场经济之外,提供一个另类的交易系统和生活空间(Giloth, 1998)。

利用社区经济发展手法,增长社区社会资本,符合资产建设的理念,强调在社区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正是因为社会资本有公共财产的特性,所以也是社区共同拥有的资产,而社区经济发展计划对社会资本进行保养及投资,更是集体性的资产建设。从微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是指个人通过与他人社会联系而获得的经济资源、信息或机会。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通过其规范、网络与信任来促使集体行动去实现共同利益。故此社会资本特指借助于所占据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把握的资源、财富、信息或机会。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决

问题的能力就更强(Putman, 1993, 2000)。社会学家高文认为,社会资本通常以三种不同形式来出现:“责任与期望”、“信息管道”和“社会规范”。“责任与期望”及“社会规范”为奖赏或制裁个人行为提供准则;而“信息管道”则是指利用社会关系取得信息。由于“责任与期望”可以生产一种利他式的规范,这种互惠规范不但有促进相互合作的可能性,亦可大大减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Coleman, 1988)。而作为信息管道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新形势下,信息对于经济行动就更重要了,但是取得信息通常是很昂贵的。只有从社会关系取得信息,相对简单换句话说,人们维系社会关系除了希望在当中得到感情、信任、责任与期望等非物质结果之外,获取信息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社会规范最重要的作用,是防止破坏性的绝对利己行为。绝对利己行为不单妨碍人际关系的建立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更会使经济交易不能发生。当有效的规范存在,会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资本,促使个人放弃自身利益,从事符合团体或社会利益的事。规范有可能内化,也可能受外部奖惩所左右。总的来说,有效的规范使人的社会和经济行为有章可循,而减低行为不定性的成本,又可以组成有力的社会资本。

## 二

社区经济发展所尝试的是一种非纯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交换生活,是一种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发挥结连各个不重复网络群的才能、技术与经验,来服务其它社群中的成员。此外,在发展社区经济的策略上,还要处理社会排斥的问题。因为社会排斥会妨碍社会参与,妨碍不重复的异质网络群的结连。

以香港的圣雅各布福群会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为例,由于近年香港经济低迷、失业严重,不少居民成为失业、开工不足或低薪的劳工,他们除了面对入息减少令生活困难外,不少技术劳工原先拥有的技术和才能亦日益贬值,甚至市场中无人问津。但另一方面社区内的居民由于收入减少,也压缩了自身的消费,加上大企业的削价倾销,令社区中的消费愈来愈少,街坊生意愈来愈难做,社区经济亦日渐破落。社区经济活动的减少亦进一步

令区内的社区网络解体,社会资本弱化,减低了居民间的互信及信息流通,以致社区未能发挥过去团结互助的角色,社区自我脱贫的资源愈来愈少,贫穷愈来愈集中,市区旧区出现贫民窟,贫穷及失业的状况令企业、家庭及社区中的社会网络解体,而社会网络解体进一步令居民贫穷及失业问题恶化,贫穷社区陷于恶性的循环(黄洪、李剑明,2001)

为打破上述恶性循环,近年来多个非政府组织开始推行不同的社区经济发展计划,包括社区“货币”、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等,而其中一个“社区经济互助计划”是由圣雅各布福群会负责组织及推行的,它希望通过社区“货币”——“时分券”的设立,促进社区内居民服务及货品的交换,通过互相帮助的方法,共同重建地区经济,达到“改善生活、人尽其才”的经济目标,同时透过增加居民间的信任与沟通,重新建立社区中的组织网络,达到增加“社会资本”,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与识别的社会目标。当然,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亦有本身的文化目标,在订价及交换的过程中,令参与者可以讨论服务及货品价值高低的准则,反省日常生活中不合理的假设。

圣雅各布福群会是香港一个非政府机构,长期在香港港岛的湾仔区为不同的社群提供多种不同的服务,而属下的社区中心专门负责组织及服务湾仔区的居民。社区中心在2000年开展了一年的社区经济发展试验计划后,正式接受了乐施会的赞助,自2001年12月份正式成立“社区经济互助计划”,至今会员人数维持在四百五十名左右。

该计划基本参照美国纽约州Ithaca HOURS制度和墨西哥的TLALOC社区货币制度,并根据香港的情况修改而成。通过建立以劳动时间为交换单位的“时分券”,让居民及小商铺可以重新组成大大小小的社区网络,交换不同的服务及商品。计划的起始目标是:增加区内居民的信任,关怀及沟通;在互助的原则下重建区内的社会资本,提倡平等的劳动,肯定参与者尊严,以及实践“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取所需”,达到社区共享的目标。

所谓以“时分券”为交换媒介是指交易媒介以时间为单位的“时分券”。会员以时间为基础相互交换服务,或利用自己的服务交换生活上的必需

品,一手及二手货物,以及教育及娱乐等等。即一小时的劳动就有一个单元的收入,服务收入可由双方议价,但最少必须是60分钟,最多是4小时,参加“计划”的会员可以在定期出版的“时分报”上刊登小广告(用“时分券”支付),列明自己可以提供服务。服务的范围包括代煲靓汤、带小朋友上课、陪伴病人求诊、维修、理发,以至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除了日常服务交换外,“计划”亦设有来“墟”活动交易日,会员可以自设小摊买二手物、小食、电器或当场提供理发、美容、中医等服务,亦可以当场寻找工作。

此外“计划”的最高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由会员担任,并由会员选举产生,会员亦积极参与不同小组及项目的工作。

以下是笔者在2003年9-12月对“计划”进行的评估研究,总结其经验及评估成效。研究以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是在2003年6月至10月期间对12名会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六次小组访谈,对象包括:低收入、新来港、单亲家庭、青年会员等。

1. 被访会员经济状况。根据最后一次检估研究问卷的结果显示,有21.1%被访会员收入少于每月3,000元,有23.7%会员收入超过15,000元;另有22.9%会员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类似国内的低保);有三分一被访会员只从事兼职工作;另有三成被访会员从事家庭工作;有一成半为退休及学生等非经济活跃人士;失业及全职工作者不足一成。

2. 来“墟”进行服务交换。有24.3%被访会员来“墟”的次数达13次或以上,可算是积极参与活动的,另有32.9%被访会员曾来“墟”4-12次,可算一般参与,而有四成会员亦来“墟”1-3次,只有1个会员从没有参与来“墟”。其平均参与次数是6.4次。此外在集中交换以外,有37.1%的会员曾与其它会员平日交换服务及货物。即在26名被访会员,在过去一年,有15名会员交换服务达1-10次,有6人交换服务11-30次,可见在进行服务交换的会员中已经有交换服务的习惯。

在访问中,有48.5%会员的“时分券”少于或等于1小时,有27.9%的会员拥有2-5小时,还有19.2%会员拥有6-10小时,有4.4%会员拥

有 10 小时以上的“时分券”。68 名会员共拥有 17,910 时分,每名会员平均拥有的“时分券”是 4.4 小时。

按社区经济互助计划,会员平均年时分收入为 408 时分,约 6.8 小时,以我们计划中 1 时分的价值约等于 1 港元计算,会员的年交易量约为 408 港元,所以我们“计划”对会员的生计改善的影响,尤其是对贫穷会员来说是较大的。

而从对参与者的访谈中发现,对他们来说“贫穷”并非仅仅是低收入,而是包含生活上的多种含义。当被问及参与了“计划”之后,较以前是贫还是富了时,他们给出了多元的答案:“心灵上富有了……人际关系富有了。”某程度上富有了……你不要的东西就给有需要的人,那我就用时分券买回我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某程度上我觉得赚了,因为那些东西摆放在家里是无用的”;“你可以得到件差不多是全新的电器,但你又连钱都不需要付出,又不是人家送给你那种感觉,而是自己赚回来的。……人家给你,你会感觉是自己无能力,好似施舍的感觉。”

贫困群体所以贫困,并不仅仅由于他们收入低,而更多是特定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运作方式的结果,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有障碍,因此减弱他们的活动能力和范围。而社区发展计划能扩大参加者心灵的空间,对文化观念作出新的思考,这亦是重要的资产建设。

此外,成员对社区归属感的增加,及利他主义的建立,也使社区和社群成为一有机及团结的整体。我们调查了会员对“计划”的目标达成及本身参与的同意度,得分最高的是“愿意协助推行这个计划”,其次是“计划令我能够帮助社区”,这显示,对“计划”有较高的认同,而且更重要的是采取一个积极主动的态度,会员觉得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可以帮助社区,建立了自尊及自豪感。

研究中我们观察到“计划”能促进互助互惠、物资循环再用的新文化价值的建立。会员表示在“时分券”的协助下,人的才能和价值获得认同,不仅是那些帮助他人的参与者,还包括那些获得帮助的。因为交换服务相对于传统福利措施他们较喜欢从“计划”体系获取服务和物品,并觉得在

这体系里更能有自尊和自强。“时分券”我有权自己去选择……我自己想做便作……又跟我时间配合……适合我自己,符合我自己经济原则。”

对会员的信任度	第一年评估		第二年评估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5	6	9.0	9	13.0
4	22	32.8	17	24.6
3	31	46.3	28	40.6
2	7	10.4	11	15.9
1	1	1.5	4	5.8
Total	67	100.0	69	100.0
	平均分: 3.37		平均分: 3.23	

当问及他们喜欢使用港元或“时分券”时,虽然他们都同意正规货币在许多方面较“时分券”有价值,但是他们仍坚持交换制度,一定要使用“时分券”作为主要交换媒介,因为这体现了另类价值(例如平等)。“如果用现金就缺乏了大家互助的意义,因为‘时分券’就是大家团体的互助。如果你用钱呢,你会太过斤斤计较,就失去互助的意义。”

3. 社会资本的增加。对于“计划”能否加强会员的社会资本,我们以“计划”能否增加会员认识新朋友,以及能否增加会员间的信任来量度。在调查中,有近 8.7% (40 人)会员因“计划”而认识新朋友,其中有近 18.8% 的人认识了 4-6 个新朋友,另有 15.9% 认识 7-15 个新朋友。在首年评估时,会员认识新朋友的平均数为 6 人,在第二年评估时所认识新朋友的平均数为 8.5 人,显示“计划”能令会员认识新朋友的作用在持续,增加了其社会资本。我们分析会员认识新朋友的数目与其参与来“墟”次数 ( $p < 0.001$ ,  $\text{Eta} = 0.632$ ) 及交换次数 ( $p < 0.001$ ,  $\text{Eta} = 0.54$ ) 呈显著相关,参与来“墟”及交换次数愈多的会员其认识新朋友的数目愈多,这显示“计划”对于一些较活跃的会员能增加其社会资本,但对于一些较不活跃的会员,则增加其社会资本的程度较少。

此外信任的增加。根据首年评估,会员对非会员的信任度的平均分数是 3.01 分,如果把它作为基线,那么会员对会员的信任度达 3.37 分,经分析我们发现会员的信任度与其参与来墟的次数呈显著相关 ( $p < 0.01$ ,  $\text{Eta} = 0.486$ ),但与其交换次数则没有相关 ( $p > 0.95$ ),即会员参与来墟的次数愈多,其信任度亦愈高,但服务交换次数愈多却并

不能增加会员之间的信任,这显示会员间能有直接接触的机会,及有机会活动、闲谈,对其增加互相的了解和对信任度有显著的帮助,但正规的交换服务却没有这方面的作用。

4. 机会与网络的增加。很多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参加社群交换计划后,社会网络扩宽了,也提高了他们在正规市场里物色工作的机会。调查显示,家庭主妇、新移民、低收入人士、低学历组和领取援助人士在货物和服务交换,其它社群活动参与方面,都较活跃。显示“计划”对一些弱势社群能有效提高其社会网络及参与。此外,信任程度也较其它参与者高,即较有信心与陌生人交往,并通过认识不同年龄及类型的朋友能建立不同质的社会网络,令社会资本更多元化。

### 三

当然,在香港推行社区经济发展计划还只是处于摸索阶段,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克服和解决,例如在改善参加者的生活状况上,效果比预期要小,规模扩大后会员参与的程度反而降低等等问题仍有待解决。此外,单靠社区经济发展,而没有整体宏观的社会政策配合,并不能根治日益严重的贫穷问题。但从香港推行上述社区“货币计划”的经验看,在中国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或以资产建设的策略来协助弱势社群,解决贫穷及社会排斥的问题,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和介入。我们认为:

首先,由于中国人文化中强调“自力更生”,个人的自尊感希望自食其力,所以以需要为本的社区发展策略,强调对居民的扶助或“输血”很可能对居民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即很多居民不愿意接受他人或其它社区的帮助,总认为接受别人的帮助就像亏欠别人的,像接受别人的怜悯和施舍。而以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改变了对弱势社群的看法,并让受助者感到本身及社区所拥有的资源、能力与技术,及自己的优势及资产,而不是聚焦于本身的不足与问题,并愿意积极的参与。

其次,香港有关经验亦显示社区经济发展超越单以改善经济/改善生活/累积为目标的模式,而以改造人际/改善文化/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目

标与经济目标并存。因为人们对于资产的理解并不单单是物质或经济的理解,有时精神性及社会性的资产甚至更重要,因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增加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增加。这种信任的增强,会令参加者之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心灵上有更大的空间去对别人及社会作出更多的关切,而这关切正是现代社会最为欠缺的。

资产建设的层次是建基于个人、家庭、社群还有社区层面的问题,由于中国人的集体性较强,过去的资产累积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家族,而市场经济又将资产累积的单位放回到个人,即贫富悬殊的基本矛盾开始出现。香港社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显示,不同层次的资产建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同时进行、互相补足的,比如在建立社区不同社群间的信任、信息及规范的三种社会资本中,我们看到了其中介的重要性,这也是社区经济发展所要做的。

### 参考文献

- [1] 黄洪、李剑明《困局、排斥与出路:香港“边缘劳工”质性研究》(香港)乐施会2001年专刊。
- [2]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 - 120.
- [3] Giloth, R. P. (1998) ‘Jobs, Wealth, or Place: The Faces of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erraden, M. S. and Nimaacs, W. A. (eds.)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Binghamton, NY: The Haworth Press, pp. 11 - 27.
- [4] Kretzmann, John & Mcknight, John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The Asset -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inois.
- [5] Sherraden, M. S. and Nimaacs, W. A. (1998) (eds.)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Binghamton, NY: The Haworth Press, pp. 20 - 40.
- [6]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7]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责任编辑:方心清]